

# 论教育科学的普及

谢维和

科学的普及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也是实现科学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重要途径。可以认为,科学的普及也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步骤和措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词在教育科学的各种文献和语言中出现的频率是不高的。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由此认为教育科学的普及已经成为问题,但是,它至少说明人们对教育科学的普及的重视程度是不高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到底教育科学有没有普及的任务,或者说,教育科学的普及是不是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目前的状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看法是,在教育科学学科建设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教育科学的普及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而且,它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本身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任务。

笔者在一所民办学校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与水平,实行双语教学,请外籍教师上课。由于双语教学的规律和特点,学生外语的听说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当一位学生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在单词和语法知识的背诵和记忆方面不如邻居家在一般学校上学的孩子时,竟然认为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太低,而要求自己的孩子退学。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教育科学的普及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呢?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教育科学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关系。尽管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科

学,具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教育活动与其他科学活动相比较,具有它自己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教育活动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一种活动,随着教育的发展与义务教育的普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参与过教育活动,对于教育活动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教育者。因为,每个人都有在家庭中教育子女的经历,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方面的教育经验。我们应该承认,社会中每个人的这些感受、经历和经验等,对于教育科学的发展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们中的有些观点和见解往往是非常精辟的,它们也是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科学常常具有一定的个别性。换句话说,教育活动作为对人的培养,面对充满个性和不同风格的个人,它所要求的是“因材施教”和个性发展,而不是像工厂中生产机器那样的批量化和标准化。这样,教育科学的规律往往不像其他科学规律那样直观和具体,常常具有比较抽象的形态和特点。而且,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也常常要求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由此,也使教育科学本身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和普遍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这两方面的特点,人们常常一方面轻视教育科学的各种规律,理论和模式等,认为它们过于抽象,不能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关于教育活动的日常经验和亲身体会简单地上升为教育科学的一般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的普及当然就是不可能的。连教育科

学本身都成为问题了。对此，日本学者明确指出，应该把“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以及教育思想分开，并建议以科学的概念来取代以往的那种教育学概念”。我国学者成有信也认为，“教育科学，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是有质的区别的”。显然，如果把教育科学与教育经验混为一谈，或者将两者等同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取消教育科学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的普及自然是无从谈起。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教育科学的现状有一定的关系。尽管我国教育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化水平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教育科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化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仍然不太高。这种状况最突出地表现在，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科学的各种概念，范畴和术语在一定程度上讲还不够精确和严谨。当然，教育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其本身也存在这样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所说的那样，“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学科（例如教育和社会工作），学科方式的整合大多不牢固和不清晰。这种趋向是由于学科的‘知识不确定性’所致……它们的象征结构是比较松散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与其他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教育科学的规范化程度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我们可以参看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世界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 Husen）等人主编的十卷本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其中的许多概念和范畴等已经达到比较规范化的程度，而这些概念和范畴在我们的使用中，常常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当然，在我国，由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词典》等教育学工具书也已经问世多年，但是，在教育实践中，这些比较科学的概念和范畴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和推广。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等，常常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范畴混合在一起。第二，与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比较，教育科学的词汇也是比较贫乏的。例如，目前我们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常常可以看到各种比较专门化的词汇，而且，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

这些词汇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在教育科学中，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却往往是比较简单和具有通用性的。我相信，如果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其结果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一门学科的词汇的丰富程度，常常也是反映这门学科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一门学科的词汇越丰富，发展程度越高和越普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门学科本身具有更高的地位，以及具有更大的学术权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教育科学的现状仍然令人不满。而且，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的普及当然也无从谈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教育科学普及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集中表现在，教育科学的专门化程度正在日益提高。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主席认为，教育的专业性正在成为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重要特征。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和体会，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这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发展。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不断丰富，特别是人们生存领域的不断扩大和需求的不断增加，个体身心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或者说，个体身心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和反映出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和尖锐。这就为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正如在经济活动还只是局限在家庭或家庭范围内时，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以及像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出现国际经济学那样，作为一门高度专业化的教育科学，也只有在个体身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都充分暴露和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在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形成。从日常经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教育科学的各种文献中，新的词汇和概念越来越多，各种术语也层出不穷。当然，这里也有翻译中食古不化和学术风气不够严谨的问题。但是，这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教育科学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从我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关于素质教育中什么是“素质”的讨论和

研究,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种教育科学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它决不仅仅是所谓的概念之争和文字游戏。而且,我们从各地所开展的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也能够发现,也恰恰是由于人们并没有完全弄清楚素质教育中“素质”的真正含义,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也说明教育科学普及的重要性。

第二,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态和特点的变化,也为现代社会教育科学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基础。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前主席波伊尔已经明确地把知识的传播作为重要的学术活动。但当时更多地只是从知识的传播的形式理解这个观点。而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科学,重要地在于它的内容和实质,即在于知识本身。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理论中,由于知识本身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知识的含义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讨论知识的问题,知识的建构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和突出。而建构主义的观点更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科学观和知识观。根据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社会的“物质性”也与传统社会的物质性的含义有所不同。对此,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大卫·帕金(David Parkin)认为,过去把物质性理解为与个人意识相对立,而“新的物质性则是把人看成是深嵌于周围的客体之中的,这种客体包括他们的环境,物质风景,身体(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身体)”。显然,在这种物质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知识,当然与人本身具有更密切的关系。这里我并不想更多地阐述这种新的知识观。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活动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所谓客观知识的运动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所谓客观知识的传递和接受的过程。根据这种新的知识观,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也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活动和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也获得了与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一样的专业性。

第三,由于教育科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以及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教育科学的分化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教育科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教育科学已经从一门或几门比较抽象和一般的教育学原理,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诸多分支

学科和具体学科的教育学科群,包括所谓的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法学、教育人类学等学科。这些学科除了具有教育科学的一般规律之外,也还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与特点。这样,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与规律,当然也就需要专门化的训练和学科背景。虽然教育学原理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这些学科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教育学原理决不能取代这些具体学科,而这也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教育科学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这里之所以讨论教育科学的专业化程度的问题,是因为教育科学的普及恰恰是与教育科学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相联系的。因为,没有这种教育科学的专业化,也就谈不上教育科学的普及。正是由于教育科学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教育科学的各种研究成果是经过专门化训练的专家的深入研究和实践而获得的,所以,才有一个需要广泛普及的任务。

然而,教育科学的普及与其他科学的普及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是与教育科学和教育活动的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其他科学的普及更多地只是涉及到“知”的范围,那么,教育科学的普及则必须达到“行”的领域。教育科学的普及不能仅仅满足于使人民群众了解,“知道”这些科学的道理和意义,它要求使人们能够真正地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和新的技术进行实践。换句话说,教育科学的普及应该使人们成为能够逐步掌握一定的教育科学的理论,从而使自己成为进行教育实践的主体。因此,教育科学的普及比其他自然科学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更困难,它的任务也更重。

其次,教育科学的普及与其他自然科学的普及的不同还在于两者的基础也是不同的。不难看到,由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常常是比较陌生和神秘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普及常常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因为,在这种普及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知识占有上的差异,以及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差异。相反,教育科学的普及却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那

样，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教育家，都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和体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也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在人们看来，教育科学的专业性与非专业性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人们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理论”，有时也常常是对于他或她来说比较成功的经验和体会，甚至会藐视教育理论的专业性。所以，教育科学的普及常常没有自然科学在普及上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科学的普及往往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这种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教育科学普及的优势。因为人民通过他们的教育实践，获得了一定经验和体会，这样也能够为教育科学的普及提供比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尽管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科学的普及也有一定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有教育科学普及不够的原因。例如，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另外常常是由于父母或者对教育科学知之甚少，或者是自以为知之甚多而造成许多错误。又如，在孩子升学的指导方面，学校、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焦虑，以及各种各样的“误导”，实在是让人感到大有普及教育科学的必要性。这里，我仅仅从高考咨询中遇到的现象说明教育科学普及的必要。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参加在北京地坛公园举行的高考咨询。而且，我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根据我的经验，考生和家长通常只是关心学校上一年录取的分数线和专业的出路，包括将来好不好找工作，是不是热门专业等等，而并不关心学校中的实际情况，包括学校的学科建设，是不是硕士点学科或博士点学科，以及学校和专业的师资队伍的情况等等。他们大多数不了解衡量一所高等学校水平和办学质量高低的标准。我要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报纸、电视等传媒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学校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由于处理不当而被激化，以至于造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特别是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父母们常常用传统的经验教育、要求自己的子女，他们不了解现在青少

年的变化和他们的心理特点，有时甚至对青少年青春期的特点也不了解。所有这些都与教育科学普及不够有关。虽然我们不能把教育科学普及的意义和重要性过分夸大，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教育科学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会影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败。而从正面的经验看，教育科学的普及常常可以促进学校教育本身的办学质量的提高，例如，目前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家长教育，以及在有些地方，地区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本身成立的家长学校，正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终身教育的推广和实施，教育与人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学的普及也日益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教育活动越来越超出了学校的围墙，或者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另外，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和人们对教育活动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这样，如果参与的人们自己缺乏一定的教育科学的素养，现代教育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中，教育科学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其他自然科学的普及更为重要。而且，我认为，这种教育科学普及的工作丝毫不比教育科学的研究逊色，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本身也需要研究。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科学的普及工作，也希望人们不要轻易地拒绝教育科学的普及。

注：

[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教育学原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页。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1998年6月，第34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北京100875]

(本文责任编辑：武思敏)